

JIUGEWEN CONG

张月明 \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CONG XIAOXUESHENG DAO ZHUZUO JIA

从小学生到著作家



从小学生

到著作家

北京燕山出版社

九歌文丛 ● 主编 · 陈启文

刘著作家

刘夫生题



张月明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目 录

前言	1
业余编书展辉煌(代序)	1
一、乡下走来的小学生	1
二、挂上小铜牌,想当学问家	8
三、走上神圣的讲坛	17
四、写作启蒙——程教授的指引	25
五、被汗水渗透的稿纸	32
六、从编写内部资料到四千封读者来信	41
七、第一本公开出版物的艰辛	49
八、难道你是清华毕业生	57
九、厚积薄发,笨鸟先飞	64
十、为工作而学,为工作而写	72
十一、小学生编书,谁来“拜读”	81
十二、参与《廉政·监察丛书》的编写	88
十三、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	98
十四、经霜的腊梅,总会开放	108
十五、永远珍视人生的价值	116

十六、图书馆名人名库的收藏	123
十七、说几句心里话	130
十八、人生寄语	134
附录一：	
湖南名人著述目录 No724	
张月明著述目录	
湖南名人资料中心审定	138
附录二：	
月到中天分外明	
——记张月明自学成才的事迹	
(原载《湖南人大工作》) 陈国荣	149
附录三：	
张月明的事故(原载《岳阳晚报》)	
李芳梅·李乐平	152

一、乡下走来的小学生

我的故乡近半个世纪出过些伟大人物，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影响中国现代历史发展的毛泽东、彭德怀，还有曾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的齐白石老人。我小时候听乡里人谈得最多的，还是齐木匠，说他在家乡做了几十年木匠，雕花匠，四十几岁学画画，一夜之间忽然到北京成了大画家，赚了许多金子银子，乡下人讲起他羡慕得要死。

1935年，正是齐木匠在北京定居，他画的是虾子比真虾子卖的价钱高得多；而回乡搞过农民运动、秋收暴动的润芝先生、搞过平江暴动的彭大黑子正开始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年10月4日，我呱呱坠地来到人世上——

我的出生地就在人杰地灵诞生了伟大人物的湘潭县，小地名叫晓岚乡晓岚村正气屋场。

光听这小地名就书卷气十足，正气屋场！

取地名的先祖不知是否因为读了文天祥的《正气歌》，有感而发，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到我出世时，我们屋场的老人谁也说不清“晓岚”、“正气”这些文雅而响亮的地名的来历了。

我家祖宗三代没读过书！

文明到了我的父辈那一代出现了断层。

父亲说，我爷爷驾过船，当过船老板，所以父母亲成家时，从祖父手里分得了七亩薄田。七亩田一年只能收 20 来担谷子，产量之低，是如今的年轻人所难以想象的。勤劳的自耕农，日出而作，日落而归，虽然薄田薄产但总算能够糊口，三代不知“子曰”为何物的父亲，居然想到送他的儿子去读“洋学堂”，不能不说这是一大进步。

也许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折射到封闭乡村的一点余光吧！只是大字不识的父辈不了解不承认罢了。这与清末与我们家乡毗邻的湘乡出过显赫的曾国藩、曾国荃曾氏兄弟，他们带出去的“湘军”，开启了地方上的一代学风有关，这种影响如清风细雨是潜移默化的。

不幸的是，“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家’祚衰”——这有点像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我出世不久，我的六个兄弟姊妹便如雨后春笋，争先恐后破土而出，父母肩上的生活重担，像雨中挑棉花越挑越重。我 11 岁那年，爷爷辞世，加之湘中连年遭灾，七亩薄田一年收不了几石几斗。1947 年 7 月，我从晓岚张氏励进高级小学毕业，我们家便完全败落了。勤劳俭朴的父亲像被飓风摧折了脊椎，再也挺不直腰杆做人，他含悲忍泪卖掉了爷爷留给他的七亩“祖业”，还清葬父和灾年不致使六个熬熬待哺的孩子饿死而欠下的一屁股债，他自己沦为了佃农！

于是，我高小毕业就失学。

可是，我不甘心呀！

那年我还只有12岁，一个当年12岁的农村孩子，并不像今天的孩子谈得出有什么理想。也许出于一种本能，一种对祖宗三代文盲的叛逆，同后来读过的《高玉宝》一样，我在心底里强烈地呼喊：

我要读书！我要读书！

不顾前辈、亲朋的反对，也不顾家里的实际困境，在那个面临失学的痛苦的夏天，我竟跑到我的一个姑姑家里，我对姑姑说：

“我要去衡山考中学。”

当时我姑姑家由于姑父死得早，家境并不好。邻居秋姑听说我要去衡山考中学堂，非常感动，便打发我一块光洋的“私房钱”。后来，我参加工作了，但工资并不多，仅仅能勉强维持家庭的开销，但我怎么也忘不了秋姑对我的无私资助。于是便请父亲带一点钱给她老人家。前年，我又专程去秋姑家看望，老人已年过八旬，身体尚好。姑把我送到相距五六里的何老爷家，因为听说何家少爷也要去衡山考中学堂。

何家是财主，何少爷坐一抬轿子去衡山，我用秋姑打发的一块光洋，花三分钱买了两双草鞋，跟着何少爷的轿子奔衡山。轿夫走得很快，我的脚被草鞋打烂了，我也只得咬紧牙关跟着轿子走。因为去衡山有近一百里路，不跟着轿子我无法找到衡山，也无法找到会考的学堂……

为了考中学，我狠心让草鞋打烂双脚，考完后几乎是爬着回到家里。父母见我这样发疯似地想读书，便同意我去湘潭考弘道中学。

我考取了。

但家里拿不出一块光洋让我去报名上学。我背着一袋子红薯去了湘潭，在弘道中学教书的“家门”张老师，听了我的诉

说，慷慨解囊替我垫了3块钱学费；后来学校守传达的长一公又垫了5块钱，我总算在弘道中学读了名义上的（9月下旬开学）一个学期。

我还是失学了！

因为家庭经济情况越来越糟，累得腰驼背曲的父亲希望我这个12岁的长子帮他共挑生活重担；而当时生活极清苦的家门老师和守传达的公公不可能长期给我垫付学费。

13岁的我，就这样成了父亲支撑这个破败家庭的第二根撑门杠。为了争口饭吃，我什么农活都干：犁田耙田，割禾打谷，农闲时同父亲一道打豆腐，挑着豆腐干、豆腐脑沿村叫卖。打豆腐卖，是非常辛苦而又利薄的活计：头天上午把豆子浸泡，傍晚收工回来，扒一口稀粥菜糊就同父亲一道推一副沉重的石磨磨豆浆。那副石磨子太沉重了，而我毕竟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营养不良过于劳累的身个长得像一根打过霜的狗尾巴草，比石磨高不了多少。我替换父亲推磨时，总要踮起脚使出九牛二虎吃奶的劲，将豆子磨完了，我也累得腰酸腿痛像只割了卵子的小阉鸡。这时，我还得打起精神跑到柴角落里，坐在灶门口，往火膛里添柴，把一口大龙槽锅的水烧滚烧沸，供父亲去冲豆浆。然后，看父亲用一根麻索吊在房梁上的十字架撑着的稀麻布去过滤豆浆，给豆浆下石膏……这已经是深夜时分了，家里弟弟妹妹和母亲都吹灯上床了。我坐在灶门口眼皮子打架，再也睁不开来，往往抱着脑壳酣然入睡。但是，我和父亲的工作尚未结束，过了一两个时辰，豆浆经过石膏的混化变成了豆腐脑儿，这时父亲把我“捶”醒：帮他一起将豆腐脑儿上箱上架，加榨，以便把豆浆加工成豆腐。我和父亲上床已经是半夜过后，但天不亮，我又得被母亲叫醒，脸也不洗，饭也不吃便挑着豆腐、剩下的豆腐脑儿去沿村叫卖：

“卖豆腐——豆腐脑儿啊——”

我要把一挑子豆腐、豆腐脑儿卖光才能回家吃饭。

冬天，有时帮姑母家修塘坝。

我几乎包了家里的烧柴，我们那地方烧柴特别短缺，为砍一担柴，来回要跑四五十里地。往往清早扒口饭就随同表哥等进山，在山上花个多钟头砍了柴，饿着肚子挑回家，已经到了下午三四点——饿着肚子挑着重担赶路的滋味，现在回想起来都感到后怕——

我和父亲一道挑着一家八口的生活重担，在劳苦和半饥半饱中迎来了1949年的解放。搭帮早年从湘潭出去闹革命，如今成了一国之尊的毛泽东主席，我们家分得了田土山林，政治上翻身作了主人，但经济上由于人多负担重，老鼠尾巴打一捶起伏不大。十四五岁的我，为了帮衬家用，我开始跟邻居王大叔学做小生意。从湘潭城里把盐、黄豆、蚕豆运回乡下卖，把乡下的辣椒、青菜贩到湘潭街上出售。有一个大热天，我用木轮子“鸡公车”推着两百多斤蚕豆往家赶，一百二十多里路刚走一半，我就中暑晕倒在路边。要不是后来赶上的王叔给我刮痧，找草药吃，也许那次我在小小年纪就抛尸路旁，抑或不死也得脱层皮！

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体肤，伤其筋骨……其实我跑湘潭做小生意，最苦的还不是体力上的消磨，而是心灵上的痛苦！每每挑着担子或推着鸡公车，走过我曾经读过一期书的弘道中学，走过学坪里的师范，或县一中、化明中学，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久久呆望着校门里跟我年龄相仿的男女学生……

我要读书！

“我要读书”这种心灵深处的呐喊，在我久经磨励磨难的少

年、青年时代几乎始终没有停止过。

路过湘潭十四总的新华书店，路过各条街的一些小书摊，我都会停下来，把什么小生意，把什么家里等米下锅抛到九霄云外，忙里偷闲地看上一阵子书，过一把读书瘾。

有时我也想买书，特别看到一本好书我会像着了魔一般把手伸到口袋里去，掏出那用汗水刚换来的一元几角钱。然而，清醒过来，我那捏着汗水渗透的纸币的手立即颤抖了！家里父母亲、弟妹还指着这点钱为他们买米买杂粮呀。从我记事时起，我家里就没添制过一床棉被，添制过一件新衣服。我们兄弟姊妹穿的，都是母亲改制了的破旧衣衫。现在破衣烂衫都改完了，寒冬腊月，弟妹们龟缩在一床铜钱厚的干牛粪硬的寡棉絮下面，一个通宵都不能睡暖身子……想到这些，我立即像猛然成长起来的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对自己说：赶快离开那个倒霉的晓岚村的正气屋场！正气屋场没有正气，只有倒霉的贫穷的邪气，我要离家，我要去挣钱，挣很多很多钱，先使父母弟妹们得到温饱，然后我再去读书或去干自己想干的事业……

当时，我把离家的赌注全押在参军上。

可惜我从小营养不良，筋骨磨损太厉害，个子虽然不矮但瘦精精的像干豆角，参军一验便被淘汰下来——我成了同年小伙子中的“次品”。

1952年6月，我这个已经吃了17岁饭的高小毕业的“次品”男子汉，赤条条一人来到湘潭城打天下。

开始，通过邻居肖伯伯肖木匠引荐，我到湘潭协力泥木社做副工。所谓副工，就是为泥水匠搅拌沙浆、挑沙浆、挑砖做下手卖苦力！别看我干瘦得像只黑猴，但从小练出了一身呆力、卖死力气是我的强项；家里破棉絮都没一床给我，我就同做副工的苦兄弟这里挤一夜，那里挤一晚，成了睡觉搭铺“游击队

员”。

这年冬天和翌年夏天，湘潭成立基建队和专区工程公司，我这个外表不扎眼却还颇有几分“内功”“呆劲”的小学生副工，经过了两次“淘汰赛”，终于随社随队顺利地转入了国营单位，成了工程公司的一名正式职工。当时月工资 30 元，至少相当于现在 500 多元，对于一个刚从农村走进城市的小学生来说，这已经是“皇恩浩荡”，简直有点受宠若惊春风得意了！

端上“铁饭碗”的头一年冬天，我用积蓄的工资买了 4 匹官布（染青布）、40 斤棉花，托人带回家。

父母亲收到以后，真比当年曾国藩兄弟打下金陵城给家里装回几船金银财宝还要高兴。这真是雪里送炭啊！母亲用这些布和棉花，弹了两床新被窝，给每人做了一件棉衣，一身新衣服。全家穿得一簇新，睡得暖暖和和过新年，试想，从饥寒交迫中走过来的人家，还有什么比这更称得上“幸福”的呢？

我离家进城的第一个目标，似乎已经达到。

二、挂上小铜牌，想当学问家

我在湘潭专区工程公司一干整整 10 年。

人生真正能干点事业的时间有几个 10 年呢？满打满算，也就四个 10 年吧，这还只能对我这样的小学毕业生说，对 20 岁前参加工作的说。

倘若你读到大学毕业，再读几年研究生，博士生，弄到 30 多岁参加工作，剩下的就不到三个 10 年了。

真是人生苦短，来日无多呀！

现在回头想想：我一个小学生，后来业余写作能有所成就，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经验是：不管你现在干什么最苦最累的，平凡的，不屑提起的最琐碎最低贱的工作，如果你能像铆钉一样死死钉在你的工作岗位上，“咬住青松不放松”，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学一行；干一行，精一行；干一行，专一行；这对于你日后的成才必有莫大好处。

这就是常言所说的，“七十二行，行行出

状元”。

我在工程公司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后来要写书，当个编著家。但是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开始写书；在同志们的帮助、指导下，我编写的 22 本书，其中有半数以上，竟是得益于我在工程公司苦干了 10 年所积累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转为工程公司正式职工后，我开始在下摄司电机厂基建工地管伙食，也就是当伙头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是这样，在基本建设工地尤其是这样。当兵的吃不好，说说怪话，发发牢骚罢了，总有个军纪管着；可是卖苦力的建筑工人吃不好，他就可能掀锅揭灶，同你这个“伙头军”拳脚相见。

我是卖苦力当副工出身的，深知饿着肚子干重体力活的滋味。所以我当了“伙头军”后，宁愿自己多起早，多摸黑，多跑路去菜场寻找价钱便宜的小菜，而把一分钱一分钱“积腋成裘”的伙食尾子，拿来给兄弟们打牙祭。人家工程队伙食棚子里一个星期吃一次肉，我这里一个星期能吃上两次；就凭这多吃的一餐肉，我这个管伙食的便受到大伙儿的拥护、抬举和爱戴。

果不其然，我只干了半年的“伙头军”，1954 年春节过后，由于“政绩显赫”，声誉颇佳，工程公司领导便把我“提拔”到了“专业技术”岗位上。在这个岗位上我又从最基本的材料保管员兼采购员干起，再计划统计员，计划统计组组长，一直干到内业工长。

1955 年我 20 岁，这年 11 月，我被抽调到公司肃反审干办公室搞了大半年肃反审干。记得第一次出差是我一个人去衡阳搞外调，带了湘潭专署公安处的介绍信来到衡阳，我便直奔公安局转介绍信，连住的地方都来不及找。那正是肃反审干的高潮，公安局转介绍信的排成长队，我站在那里不顾肚子饿，也

不顾春寒料峭，冻得一身鸡皮疙瘩，转了介绍信便去翻查审查对象的档案材料，天黑了走出公安局我才去找招待所住下来。在衡阳我一连四五天白天晚上连轴转，终于完成了领导交给的任务。第二次出差是同公司保卫科一位副科长去武汉，后来又去过常德、长沙等地搞外调。我虽然年轻，但工作劲头很大，由于圆满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各项任务，工作结束时，公司人事科长找我个别谈话：

“小张呀，你最近工作怎么样？”

“嘿嘿，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当时老实得想不到这是人事科长，依照惯例在对我进行考察。

“我是说，你对工作还满意？”

“很满意。”

“知足？”

“知足？”

“你对组织上没有什么要求？”

“没有，”我真心实意地说：“我一个小学生、农民，能进国营单位工作就已经很感谢公司的领导的爱护，栽培了。”

“好。”人事科长满意地说，“你很实在。”

考察的结果，当场发给我一张干部履历表和一块公司的小铜牌。

我正式转为了国家干部。

当我戴着小铜牌出现在昔日一同卖苦力的难兄难弟们面前时，他们的恭维话里面明显地含有嫉妒：

“看，你这家伙可神气了！”

“人家干了半辈子泥水匠，如今还戴不上小铜牌，你这家伙总共才干了几年？倒让你戴上了！”

“人家张月明是走上桃花运了。”

是呀，我真是一步登天，青云直上——至少在当年我的确有过这种感受；我想我这是托共产党毛主席的福啊！

从挂上小铜牌的那天起，我就暗暗下过决心：我不能当南郭先生，不能让领导和同志们失望，我一定要成为建筑行业的一个行家里手。

还是在担任材料保管员和采购员的时候，我就花了一年时间死记硬背各种建筑材料的型号、规格、重量、价格；估算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所需的不同材料数量。如一立方米不同标号的水泥砂浆需要多少水泥，多少粗砂、水；一立方米不同标号的钢筋混凝土需要多少钢筋、多少水泥、砂子、石子、水；每一百平方米建筑面积需要多少红砖、多少瓦、多少砂、多少石子、多少石灰、多少水泥、多少木材、多少钢筋、多少玻璃、多少小五金、多少工日等；每一百平方米屋面需要多少油膏、油毡……各种不同建筑，设计图纸不同，所需建筑材料大不一样。就拿小五金来说，其中包括铰链、风钩、拉手、插销、门锁、螺钉、铁钉，诸如此类……要分别记住它们的不同型号、规格、单价，这无疑是一长串天文数字。

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深深感到要当好一名材料保管员，差不多就成了一名建筑材料方面的专家！

难怪在理工大学里，专门设有建筑材料专业。

我是一个高小毕业生，现在我要担负一个大学生才能胜任的职责，我只能采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去抓紧学习了。

搞了一年多材料保管、采购，刚刚熟悉业务，我又被“提拔”到一工区计划统计的新岗位上。

一切又得从头开始。

无论在公司还是在建筑工地，计划统计都是十分重要的工作。在工地上，要代表乙方（施工企业）向甲方（建设单位）办

理隐蔽工程验收等，更为重要的是讨价还价的工程预算、结算，在内部，你要负责看图翻料，计算各种不同类型的材料规格、数量，签发班组工程任务单，办理工程验收结算。如果你是个南郭先生，或者是一个不甚精通业务的半瓶醋，对外你就可能让公司蒙受重大损失，对内就可能把管理搞得一塌糊涂。

有这么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

在易家湾砖瓦厂建设工地，我担任计划统计组长，下辖六名组员。有次给轮窑高大的烟囱下任务单，我把这个任务交给公司来协助工作的一位老技术员。听公司里的同志说，此人在民国时就给老板搞过工程预算，文化水平很高，是解放时留下来工作的旧职人员，技术上很有一套。

没想此公故意给我出难题，他装得很谦恭地道：

“几十米高的烟囱是个大任务，还是请组长亲自下单吧。”

开始我瞄过一眼图纸，烟囱下方上圆，那空心的圆柱自上而下逐渐加大，到了底面与烟道结合部，方圆切割、重叠，计算非常复杂。我这小学生没有金刚钻，揽不了这份瓷器活，便对“老技术”客气地说：

“您是内行，经验丰富，还是劳您的大驾。”

“不不不，不能越俎代庖。”

什么“越俎代庖”，当时我对这句成语还听不懂。明白“老技术”是想故意考考我，给我小鞋穿。我便二话不说收回图纸、任务单，轻描淡写地道：

“那好，我来下单。”

如果我学过代数、几何，计算一个烟囱的工程量，诸如要用多少红砖多少水泥多少钢筋多少工作日，那是驼子作揖——起首不难的事情。可我只高小毕业的水平，我又没正式参师学过木匠、泥水匠，连师傅口传心授的“土办法”都没有。但